

真杉靜枝的「故鄉」／「異鄉」： 〈女兒〉、〈某個女人的生平〉中的 「殖民地台灣」記號

吳佩珍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相對於真杉靜枝過世後持正反極端評價書寫的傳記或傳記小說，真杉靜枝生前親身所執筆的自傳性小說則以不同角度，與將之型塑成「惡女」形象的傳記與評論成為對照性文本。真杉靜枝的文風帶有極強烈的「私小說」風格，特別是她與武者小路實篤以及中村地平之間的情事回顧，都成為她多部作品的題材，因而與真杉靜枝的「惡女」形象以及男女情事糾葛不斷的評價有極密切的關係。然而除了環繞與男性情事的「私小說」文本之外，真杉在生前也寫下回顧自己生平自傳性色彩濃烈的小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傳小說，可舉〈女兒〉（むすめ）（《新潮》，1940年5月）以及〈某個女人的生平〉（ある女の生立ち）（《新潮》，1953年5月）做為代表。〈女兒〉以及〈某個女人的生平〉分別發表於戰前與戰後，是觸及其台灣生活經驗的自傳小說。這二篇傳記小說發表的時間跨越戰前／戰後，當中經歷日本敗戰，台灣從隸屬日本帝國殖民地到脫離日本統治。也因此，真杉分別寫成於戰前／戰後的二篇自傳小說，其中觀點的轉折呈現了對照。本文試圖爬梳真杉靜枝兩篇自傳小說中自我形象的型塑與

「殖民地台灣」記號的關係，同時探討這樣的「殖民地台灣」記號，如何反覆地出現於真杉靜枝的自傳小說中。

關鍵詞：真杉靜枝、自傳小說、〈女兒〉、〈某個女人的生平〉、殖民地台灣

Masugi Shizue's Homeland/Outland: “Colonial Taiwan” in “Daughter” and “A Woman's Life”

Wu, Pei-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formation of Masugi Shizue's image focused mainly on her biographies, which were all published posthumously. However, Masugi's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were in direct contrast to those biographies, biographical novels and criticisms which stressed that she was a “wicked woman.” *Daughter* and *A Woman's Life* were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that were published from pre-war to post-war periods, and depicted her life experience in colonial Taiwan. *Daughter* mainly describes her reconciliation with her mother upon her return to her “home” in colonial Taiwan after running away for sixteen years. *A Woman's Life* describes a woman named “Shizue”, Masugi's real name too, as she looks back on her own love affairs, family matters, her “home” in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defeat of Japan. This novel mixes historical realities with her individual history. These two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also show colonial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This is where her parents' home was located, and where Masugi spent her teenage year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Masugi's image and colonial Taiwan, as well as how colonial Taiwan became an icon related to her memory of her mother.

Key word: Masugi Shizue, auto-biographical novel, *Daughter, A Woman's Life*, colonial Taiwan

真杉靜枝的「故鄉」／「異鄉」： 〈女兒〉、〈某個女人的生平〉中的「殖民地台灣」記號¹

一、序語

相對於真杉靜枝過世後持正反極端評價書寫的傳記或傳記小說，真杉靜枝生前親身所執筆的自傳性小說則以不同角度，與將之型塑成「惡女」形象的傳記與評論成為對照性文本。真杉靜枝的文風帶有極強烈的「私小說」風格，特別是她與武者小路實篤以及中村地平之間的情事回顧，都成為她多部作品的題材，因而與真杉靜枝的「惡女」形象以及男女情事糾葛不斷的評價有極密切的關係。最典型的例子便是 1938 年竹村書房所出版的處女作品集《小魚之心》（小魚の心）。其中收錄的第一篇作品〈小魚之心〉的人物設定，作中女主人公阿樞前後任情人的男性，分別以武者小路實篤和中村地平為人物模型。而同一作品集中〈發話者〉（話しかける人）與〈松山氏の木屐〉（松山氏の下駄），則以自己與武者小路實篤的「不倫戀」為主題，描寫三角關係的愛恨糾葛；而〈風吹過〉（風わたる）則以與中村地平的戀史為藍本，描寫男女主角因為女方的種種問題，使二人的結婚之途窒礙難行，這正投射出現實之中真杉靜枝與中村地平二人的關係。或許正因為真杉靜枝的「私小說」風格如此強烈，且多以暴露自身男女情事為主題，因而導致迄今為止真杉靜枝相關的傳記小說多渲染她的男女情事，反而掩蓋了對其文學的評價。然而除了環繞與男性情事的「私小說」文本之外，真杉在生前也寫下回顧自己生平自傳性色彩濃烈的小說，其中最

¹ 真杉靜枝，〈女兒〉（むすめ），《新潮》（1940 年 5 月）以及〈某個女人的生平〉（ある女の生立ち）《新潮》（1953 年 5 月）。

代表性的自傳小說，可舉〈女兒〉（むすめ）（《新潮》，1940年5月）以及〈某個女人的生平〉（ある女の生立ち）（《新潮》，1953年5月）做為代表。〈女兒〉以及〈某個女人的生平〉分別發表於戰前與戰後，是觸及其台灣生活經驗的自傳小說。發表於戰前的〈女兒〉，是以真杉靜枝出走台灣之後再度返回「故鄉」台灣，與睽違十六年的母親重逢、和解的經歷為藍本；發表於戰後的〈某個女人的生平〉則以第三人稱——同時也是作家自己的本名「靜枝」，凝視自己的男女情事、家庭關係、「故鄉」台灣以及日本戰敗一連串的歷史事實與個人生平的交錯與糾葛。無獨有偶地，這兩篇回顧真杉自己生平的自傳性小說，都描寫了她度過重要的少女時期以及父母定居的日本殖民地時期的台灣。這二篇傳記小說發表的時間跨越戰前／戰後，當中經歷日本敗戰，台灣從隸屬日本帝國殖民地到脫離日本統治，而戰前定居台灣的父母以及妹妹也被迫返回日本投奔真杉靜枝。這對戰後真杉個人的生活以及文學創作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也因此，真杉分別寫成於戰前／戰後的二篇自傳小說，其中觀點的轉折呈現了對照。最明顯的，〈某個女人的生平〉以跳脫「私小說」慣用的第一人稱手法，企圖以客觀的第三人稱「靜枝」凝視個人／家國以及帝國／殖民地二者之間在歷史流轉的時代潮流中，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關係。

本文試圖爬梳真杉靜枝兩篇自傳小說中自我形象的型塑與「殖民地台灣」記號的關係，同時探討這樣的「殖民地台灣」記號，如何反覆地出現於真杉靜枝的自傳小說中。

二、飄洋過海到／出「台灣」——〈女兒〉與〈某個女人的生平〉的「故鄉」與「異鄉」

〈女兒〉以及〈某個女人的生平〉皆以自傳體形式創作。當真杉靜枝在此兩部自傳小說中回顧生平，「台灣」記憶、「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建構「自我」的過程，都成為真杉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記號。

〈某個女人的生平〉寫於戰後，標明為「自傳小說」且以本名「靜枝」進行第三人稱敘事，回顧自己的生涯；同時也回顧真杉家族從戰前定居台灣殖民

地，到日本戰敗被迫返回日本——亦即，君臨的「殖民者」到敗北的「敗者（被殖民者）」的始末。

從〈女兒〉的內容略可推測，此係寫於她與中村地平相偕訪台的 1939 年 3 月之後。現實中，真杉靜枝於 1939 年 3 月與中村地平一起訪台，中村此次台灣行的目的是為了小說取材，因而對牡丹社事件進行詳細的資料蒐集以及地緣調查²。真杉靜枝則是為了探望十六年未見的生病的母親。為了擺脫父母安排的婚姻，真杉逃離台灣前往大阪並轉往東京之後，此後便未再返回台灣³。從小說以及後來的事實可推斷，真杉靜枝與中村地平已經有了協議，將此次的台灣之旅，當成是二人分手前最後一次的共同旅行。〈女兒〉一作亦可看出真杉與母親之間的愛恨情仇，這也是真杉首次以自傳性小說形式回顧自己在台灣的少女時代，以及其如何為了逃避母親安排的婚姻而從台灣出奔到大阪，一別十數年之後，返台探望母親的經過。

〈女兒〉一開始描寫女主人公梶子夢見母親被火車輾斷了大腿，苦苦哀求醫師為母親施以麻醉。從夢境醒來，梶子發現自己對十四年⁴不見的母親始終冷淡以對的最大原因，便是少女時期自己與母親返台共同生活以來，母親總是叱責自己「不愛母親」。梶子回憶，少女時期起自己便對母親的生理現象有著強烈的抗拒感。在台北女校時期，因母親生病而被急忙地召喚返回中部的家，返家途中巧遇剛剛診療母親完畢的醫師，梶子壓抑著不安，詢問醫師母親的病況，醫生回答：「沒有大礙，是流產，有三個月了。」⁵聽到這樣的回答，梶子的表情「突然四分五裂地飛散般，狼狽不堪。道別了醫生的人力車之後，對於即將

² 中村地平訪台的 1939 年，發表了以 1930 年台灣原住民最大的武力蜂起「霧社事件」為題材的〈霧の蕃社〉，隔年發表以 1871 年的牡丹社事件為題材的〈長耳国漂流記〉《知性》（1940 年 10 月-1941 年 5 月）。參照河原功〈中村地平の台湾体験〉，《台湾新文學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學との接点》（東京：研文出版，1997 年），頁 24-51。

³ 真杉靜枝敘述 1939 年的台灣行，已與母親「睽違」了十六年，由此可推測真杉靜枝從台灣出奔至大阪，約在 1923 年左右，生於 1900 年的真杉靜枝此時則約為 23-24 歲。而武者小路實篤於昭和元年（1926）自「新村」（新しき村）所在的宮崎縣，遷移到志賀直哉所在的奈良，此時擔任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真杉靜枝，因取材關係到奈良造訪志賀直哉與武者小路實篤，也因此結識武者小路實篤，進而發展戀愛關係。參照十津川光子《惡評の女—愛と悲しみの生涯》與〈年譜〉《武者小路實篤集》（東京：筑摩書房，1976 年）。

⁴ 作品中記述二人已有十四年未見。

⁵ 本文〈女兒〉（むすめ）引自收錄於《愛情の門》版本，下同。參照真杉靜枝，〈むすめ〉，《愛情の門》（東京：國際女性社，1948〔1940〕年），頁 7。

要到這樣的母親的病床前，感到厭惡得不得了」(〈むすめ〉，頁 7)。梶子與母親雖有血緣的連繫，卻感情生疏，從青春時期梶子對母親生理現象的忌憚與厭惡，便可看出其對於母親的「女性性徵」的強烈排斥，這使得自己與母親在感情上以及身體上都有著嚴重的疏離。梶子回想，自己當時在北部女校宿舍初潮來臨時也沒告訴母親，暑期返家時，母親竟擺出一副「知道此事當然是作為母親的權利」的表情質問梶子，「梶子的心彷彿被揉碎的花瓣破碎了。心情宛如要哭泣般，但卻故作粗暴搖頭站起身來，穿著水手服制服，腳踩上拖鞋便從後門出來」(〈むすめ〉，頁 8-9)。梶子當時對母親產生了極度厭惡的心情，「梶子的神經讓她感覺，甚至連母親稍稍圓潤的臉頰都覺得不潔而無法正視」(〈むすめ〉，頁 9)。而這使得梶子心生無論如何都想遠離母親的念頭。也因為梶子對於母親生理與心理的抗拒，原本應該返家探視流產而臥病在床的母親，卻連「病人房間的和式紙門都沒開便折返了」(〈むすめ〉，頁 10)。

在〈女兒〉裡，梶子對母親厭惡的情感描寫，似乎顯得突兀。相對地，在戰後創作的傳記小說〈某個女人的生平〉中，主人公「靜枝」對母親厭惡情感的起源與生成有了確切的描摹。與父方的祖父母同住的小猴子⁶，小學三年級時父母自台灣返鄉，表面上的理由是父親為了療養在台灣感染的風土病，但事實上是祖父母好不容易認可「靜枝」父母的婚姻，這也是「靜枝」的母親第一次得以進入丈夫父母的家門。「靜枝」父母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將小猴子帶走，返回台灣」⁷。這是「靜枝」對父親第一次有了記憶，對母親的記憶則更早些。她隱約記得更年幼的時候，曾在家中男僕的安排下與母親見面。當時正值黃昏，小猴子因思念母親而啼哭，她依稀記得母親從另一頭的「頭簪山」走來，對此時母親衣服的顏色與體味都留下了印象。男僕代小猴子向母親要「拳頭(糕點名)」，但母親給的不是糕點，卻是如字面意義般地突然握起拳頭，輕輕地打在

⁶ 在〈某個女人的生平〉中，作者稱呼幼年時期的「靜枝」為「小猴子」(小猿)，因為其身型極為瘦弱，而與祖父母同住。這樣的描寫，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指出這乃是虛構。真杉靜枝基本上都由母親撫養，只有父親因風土病自台灣返回故鄉療養時，真杉靜枝與妹妹勝代曾分別在福井以及大阪上小學。見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愛と悲しみの生涯》，頁 36-37。

⁷ 真杉靜枝，〈某個女人的生平〉(ある女の生立ち)，《新潮》(1953年5月)，本文引自尾形明子、長谷川啟監修《戰後の出発と女性文学》第八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3年)，頁 137。

怯弱怕生的孩子頭上。因為粗笨的母親的背叛，此時小猴子所受的心靈創傷一直沒有平復（〈ある女の生立ち〉，頁 137）。之後母親從台灣接回在父方祖父母死後便寄居於母親大阪娘家的「靜枝」，前往父親的勤務地——「台灣南端一座叫做 K 的古城周圍附近的小城鎮」⁸。而在前往台灣的船艙裡，發生了「因為自己身上流著一半來自母親的血，所以這孩子痛苦到半身發黑的程度」的意外。母親動輒亢奮地責罵她：「裝模作樣，跟你父親一樣，神經質的怪小孩」（〈ある女の生立ち〉，頁 139）。當孩子發現母親突然大量出血時，母親竟對她說：「孩子不好好珍惜父母，所以才會這樣」。這讓她嚇壞了，就在接近亞熱帶的海上，「這只不過是母親普通的出血狀態，對母親只懂得尊敬的孩子，在之後的某個時候見到了與母親一樣狀態的出血時，才認知到當初所面臨的困惑是如何的強烈。這個讓她感到羞愧的衝擊，令十五歲的她，一半的身體彷彿就要淤血般，臉頰上的赤紅也滲透到了心底。自此以來便一直對母親懷抱著憤怒。」（〈ある女の生立ち〉，頁 139）。

對照真杉靜枝戰前與戰後所寫成的自傳小說，真杉與母親之間的疏離以及生理性厭惡的描寫宛若互補的拼圖般，有了較清晰而完整的輪廓。二篇小說中，母親對女兒在態度上的背叛以及生理現象的誤導而造成的心理創傷（psychological trauma），使得女主人公在成長過程中的母女關係，產生難以彌補的裂痕。

真杉靜枝的自傳小說中何以母親對女兒充滿著憎惡感，若追溯真杉雙親的結合及如何渡台緣由，便能提供更清楚的解讀線索。真杉靜枝的傳記包括傳記小說當中，十津川光子的《惡評之女》因為得到真杉靜枝妹妹道野勝代的資料提供以及協助，對於此中的來龍去脈有較清楚的爬梳⁹。根據十津川光子對真杉

⁸ K 古城，即日據時代的舊城（kyujo），即今日左營附近。

⁹ 先行研究中對真杉靜枝雙親結合經過有所著墨者，如李文茹的《帝國女性と植民地支配—1930～1945 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大学院人間情報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5 年）的第一章〈殖民地を語る苦痛と快樂—台湾と日本のはざまにおける真杉靜枝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形成〉。此文指出真杉靜枝的父親千里，在台灣的一開始便在台中葫蘆墩擔任神官，與事實有出入。真杉靜枝的父親千里一開始於台灣從事教職——也是延續其在日本所擔任的教師工作。真杉靜枝從台灣出奔至日本，之後與武者小路實篤發生不倫戀的消息傳回台灣，在日本人共同體引起軒然大波，千里也因此被迫辭去教職，進而於台中葫蘆墩開始擔任神官。真杉靜枝在 1933 年 10 月

千里一家的調查，真杉家族在明治維新之前世代為福井藩藩士，屬於武士階級；明治維新之後，祖父良平開始轉業成為醫生，在殿下村開設「真杉病院」。明治三〇年（1897年）真杉千里自福井師範學校畢業之後便擔任教職。任職於清水小學校時。雖已有了內緣關係的妻子，卻讓黑川密伊（みつい）懷了孕，腹中的孩子即為真杉靜枝。據說黑川密伊在懷孕期間希望真杉靜枝能胎死腹中。正在這樣的情況下，真杉靜枝以私生女的身分出生，直到真杉千里拋棄已懷有身孕的內緣妻，才得以申報戶口。此外，真杉千里的母親也一直不能接納商家出身的黑川密伊，真杉千里才會帶著妻子女兒遠渡殖民地台灣，打算在此地重新展開人生。遲至真杉千里在台灣罹患風土病返回福井療養，真杉千里的雙親才真正接納黑川密伊¹⁰。〈某個女人的生平〉對此經過有部分的呈現。例如小猴子的父親向雙親訴說妻子如何跟著自己在台灣受難一直至今的描寫：「在台灣，我讓她受了許多苦，就算受了男僕的欺侮，千代一直忍耐到現在也不哭。普通的女人在那樣的破落戶，早便哭起來了，不是嗎！」（〈ある女の生立ち〉，頁137）。從真杉靜枝的自傳小說觀察真杉何以在作品當中屢屢突顯母女的情感疏離以及母親對女兒強烈的敵意，以及真杉一家必須自內地來到殖民地台灣的緣由，實則都其來有自。「台灣」的記號與真杉靜枝的出生、乃至不見容於社會的父母的結合，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這也說明了真杉靜枝的個人史以及家族史書寫是透過「台灣」記號的反覆而建構。而由真杉靜枝的個人傳記與家族書寫所衍生的作品，也與「台灣」記號有了緊密的結合。

11 日刊載於讀賣新聞的〈送走父親之日〉（父を送る日）中，提及父親因自己與武者小路實篤的不倫戀醜聞，而被迫辭去教職的這段往事：「六年前，成為報紙話題的女兒的醜聞，讓父親被燒灸得體無完膚。也因此不得不被迫辭去學校的職務。在狹小的殖民地社會，被人背後指指點點。」同時參照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愛と悲しみの生涯》，頁32。以及真杉靜枝〈ある女の生立ち〉，頁162。另，李論文第一章將真杉母親黑川密伊（みつい）誤記為「住持的女兒」同時將真杉千里故鄉誤記為「福島」，事實上黑川密伊娘家經營澡堂以及居酒屋，而真杉千里與黑川密伊的故里應為「福井縣」，同時「住持的女兒」應為密伊的母親房野（ふさの）。根據十津川光子的調查，房野是位於福井市田原町的願照寺住持的女兒。黑川密伊娘家之後因破產，遷移至大阪。同樣將真杉母親黑川密伊誤記為「住持的女兒」者，尚有楊智景的〈解題〉，收於王德威、黃英哲編《華麗島的冒險》（麥田出版，2010年1月），頁248。真杉靜枝曾在隨筆〈幼時〉（幼い頃）回憶母親娘家：「人來人往」，「母親娘家是有著令人心情沉靜的三絃（按：三味線）聲，旅館樣式、風格洗鍊的房子。」參照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頁19，與真杉靜枝，〈年幼時分〉（幼い頃），《甲斐なき羽撃き》（東京：協力出版社，1940年9月），頁119。

¹⁰ 參照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頁19-20。

寫於戰前 1940 年〈女兒〉中母女關係的裂痕，仍須對照〈某個女人的生平〉中「靜枝」自幼小時起與母親關係的描寫，才能有較清楚的解讀方向。而真杉靜枝文學中對於女性在家庭以及社會結構中所遭受的女性「性」(female gender) 差異，以及因差異而遭受壓迫進而被迫處於劣勢，向來有極深刻而細緻的描寫，這樣的描寫也被視為對家父權制度的一種抵抗。然而透過這兩篇自傳性小說的呈現，我們會發現她企圖呈現的壓迫源頭是來自於她的母親，以及殖民地台灣封閉的日本人共同體社會。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所揭櫫的女性教育準則「賢妻良母主義」，是基於朝向近代國民國家發展的大前提之下，將女性教育納入國家建構體制，同時也讓女性身體的管理納入了國家的身體管理機制¹¹。前近代的家父長制度也挾「近代化」之名，扮演起監理管控的角色。真杉靜枝筆下描摹的成長於帝國殖民地台灣那位自我化身的少女，也未能例外地受到嚴格的管控。〈女兒〉當中描寫「雙親為了保護這個女兒的青春，害怕得彷彿居住在蕃界般。(〈むすめ〉，頁 11)」因此，當愛好文學的梶子與父親學校同事的國語教師龍田親近，便成為家中的重大事件。某日，龍田在梶子參加了插花講習會後的歸途中等候，兩人在深夜散步了約一小時。之後這引起了母親的懷疑。她用顫抖的聲音對父親說道：「龍田老師太過分了！在深夜裡把這麼年輕的姑娘帶出門。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我們非得帶梶子去看醫生不可了，因為不曉得到底有沒有被弄傷了嘛。」而「梶子從未有如此時一般受到母親話語的傷害」(〈むすめ〉，頁 14-15)，也因此下定決心只要能夠離開母親，她可以不計一切。而這個時候，母親也急於將女兒嫁出，於是在梶子畢業之前的寒假，便決定了她與大她十七歲的松本忠左衛門的婚事。她感覺到梶子「因為討厭母親的關係，希望能在畢業的同時離家，開始不排斥這樁婚事」(〈むすめ〉，頁 15)。

透過作品，真杉點出了殖民地日本人共同體中的封閉性，其對女性身體的管控比起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我們可從前述的引文看出，對這位

¹¹ 當時女性雜誌的大量發行，特別是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間，強調女性身體的啟蒙教育以及「貞操」重要性成為當時女性雜誌的主流。參照齋藤美奈子《モダンガール論》(東京：マガジンハウス，2000 年)，頁 134-146。

成長於殖民地台灣日本人共同體的日本少女行身體管控的並不是父親，而是母親。

先行研究當中，關於真杉靜枝出走台灣前往大阪，後與武者小路實篤發生戀愛關係繼而轉往東京，大都被視為真杉靜枝係為了逃避父母所安排的與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之間的婚姻。但仔細解讀真杉的自傳小說，便能理解真杉所企圖呈現的是在青春期成長過程「身體自主性」如何受到嚴格的管控，因而思考如何利用婚姻逃離與母親的關係。這與迄今為止所認知的真杉靜枝遠離台灣的理由——逃離「婚姻」——有不同的詮釋。另外，與真杉靜枝個人戀愛生活的多采多姿呈現奇妙對照的是，其戰前作品中對於女性情慾的描寫與處理，可說是淡泊甚至於壓抑。這一點，對照她寫於戰前與戰後的兩篇自傳小說，其中對「處女情結」與「身體純潔」描寫的反差，便可清楚看出。例如，真杉靜枝在〈女兒〉中所刻意強調的，係梶子如何在母親安排的婚姻當中「全身而退」。

在〈女兒〉中，母親與松本忠左衛約定，「讓她在上學之前，只在形式上先舉行婚禮喲，只有形式喲。接下來便等到畢業之後……」（〈むすめ〉，頁 17），再讓梶子回到學校完成學業。婚禮後三天，「梶子如母親所說的，她沒受到松本忠左衛染指的身體穿上了褲裙朝學校出發了」（〈むすめ〉，頁 18），然而梶子卻在七天之後到達了大阪祖母家。「在背叛雙親的不安的動搖中，跨越台灣獨特的逆流而上的濁流的鐵橋，從車窗向外茫然地看著露出紅土肌膚的群山以及甘蔗田的波浪。景色的每個角落裡，父母親的面影無所不在（〈むすめ〉，頁 18，底線為筆者所加）」。

從以上的描寫我們可看出「殖民地台灣」地景特殊的呈現，以及台灣地景「記號」與真杉靜枝雙親的緊密連結。真杉將台灣稱為「第二」故鄉，其實正是與自己雙親臍帶相連的重要記號¹²。我們看到女主人公梶子費盡氣力企圖利用婚姻逃脫母親的掌控，然而對於身體「純潔性」以及「處女情結」的刻意突顯與強調，又顯現真杉靜枝陷入對女性身體「純潔」以及「處女情結」的迷思，

¹² 真杉靜枝在發表〈女兒〉的第二年，即 1941 年，在隨筆〈台灣新銳作家介紹〉中如此敘述：「我雙親所在的台灣也可說是我的第二故鄉」。參照真杉靜枝，〈新銳台灣作家介紹〉，《週刊朝日》，1941 年 6 月。

執著於女性身體「純潔」複雜的情結部分反射了她對母親雖有憎惡卻無法割捨的情感矛盾。對照戰後的自傳〈某個女人的生平〉觸及自己在台灣的婚姻以及出奔至大阪的經過，更可顯現兩篇自傳小說之間的出入與矛盾，以及真杉對於處女情結的迷思。〈某個女人的生平〉敘述自己從台灣出奔來到大阪，住進了YWCA的基督教會宿舍。此宿舍標榜入宿者全都是「神聖的處女」（〈ある女の生立ち〉，頁144）。而「只要參與擁有神的祝福的資格，光輝閃耀的處女們的談話，靜枝便只會在見不得陽光，自己內部中的罪惡摒住氣息」（〈ある女の生立ち〉，頁144），「這裡的女孩全都是處女，沒有一個女孩子是有瑕疵的。自己曾以妻子的身分有過男性經驗，而母親彷彿像處理自己的東西般，將她置入這樣的汙穢當中。然而這並非是她的過失，逃離汙穢這樣的心情奔向她的心中。母親的手及其意志加諸在她身上的，似乎是全身都要長滿了霉菌般，讓她覺得有著洗刷不盡的恥辱。而那樣的罪惡與流有母親血液的生命一起在身體裡發出疼痛」（〈ある女の生立ち〉，頁144）。

對照〈女兒〉中對於處女純潔「絕對性」的執著，〈某個女人的生平〉中描寫的對於失去處女的傷痛、以及強調自己失去處女乃是來自母親的「外力」因素，可看出真杉靜枝對於女性身體純潔有著深深的迷思；而這樣「被恫嚇」的觀念，是真杉靜枝的私小說風格作品中，描寫兩性關係時的重要特徵。特別是以她與中村地平的戀愛關係為藍本的兩性關係書寫，女主人公總將未能與男主人公以婚姻形式結合的最大主因，歸咎於身體「純潔性」的闕如。此外，發表於〈女兒〉之前的〈流〉（ながれ）（《新潮》，1939年1月），便是呈現女主人公處女情結心性的典型例子¹³。〈流〉描寫女主人公露子得知戀人春吉被徵召入伍，她藉此契機思考已經有過長期同居生活的二人是否要分手。在〈流〉中我

¹³ 〈女兒〉與〈某個女人的生平〉雖是近乎真實的自傳小說，但仍有與事實出入的修飾與改寫。例如〈女兒〉中女主人公保有了處女的純潔逃往大阪，而〈某個女人的生平〉中小猴子（女主人公）自幼由祖父母收養等情節，均為虛構。事實上真杉靜枝在父母安排下，在大正7（1918）年與藤井熊左衛門結婚，婚後不但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同時也被傳染性病，因而從台灣出奔，逃離婚姻。另，真杉靜枝一直以來由父母親扶養，只有在十一歲左右因父親在台灣罹患風土病，而與雙親以及妹妹返回父親的故鄉福井縣，就讀兩個學期左右。參照十津川光子《悪評の女—愛と悲しみの生涯》，頁36-63。此外，真杉靜枝在戰前以及戰後的自傳小說當中各於「處女喪失」書寫的異同，這與真杉在戰後對於情慾書寫似乎有了更直接且開放的筆觸，應不無關係。

們可看見，露子認為來自幸福家庭的春吉的純潔人格淨化了自己，而一直以來春吉忌憚與之進入正常婚姻關係的原因，是露子與清純少女的新嫁娘形象及年齡有著遙遠的距離，因此而躊躇不前（〈くながれ〉，頁 69）。

雖然母親與松本忠左衛門前往大阪，企圖將梶子帶回台灣，卻無功而返。就在這樣無解的狀態之下，梶子獨自一人從台灣、大阪一路來到東京，與台灣的母親一別十四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梶子「未曾有過感覺懷念母親的機會」（〈むすめ〉，頁 26）。而在這期間，梶子復與有家室者（以武者小路實篤為藍本）發生戀愛關係。但隨著失戀，她也必需獨自維持自己的生計，不知不覺間梶子對自己雙親有所抱怨：『對我而言，你們是什麼都無法給我的無能者』，她在內心當中如此踐踏著無論經濟方面或是愛情方面什麼給不起自己的雙親」（〈むすめ〉，頁 27）。梶子在都會中一路跌跌撞撞走來，焦急地想要擁有女性的幸福的安定場所，卻已經年屆三十；夢見母親被火車輾斷了大腿人在手術室當時，便過著這樣的飄蕩生活。那段期間，梶子瞞著比自己年輕的春吉（以中村地平為藍本）的雙親，與之過著同居生活。春吉不但是有雙親疼愛的獨子，大學尚未畢業，也在雙親的經濟資助下在東京學習繪畫。由於春吉這樣的出身，梶子也為其純潔的性格特質所吸引。有時看著春吉的母親寄來種種生活用品給春吉，心中百感交雜。在覺悟到自己有朝一日將會離開春吉的同時，梶子也回顧起從未送過任何東西給自己的母親的容顏，「彷彿是非常遙遠的陌生人般」，梶子將這樣毒辣的自言自語擲向母親的臉：「也由於這樣的父母，所以我才一直無法得到幸福」（〈むすめ〉，頁 33）。

〈女兒〉後半部的描寫隱約披露從台灣出奔之後真杉靜枝的男性關係，僅僅是真杉靜枝一直以來所缺乏的父母溫情的「代用品」。女主人公梶子與以武者小路實篤為藍本的有家室者發生戀愛關係「梶子從那人的身上受到雙親無法誘導出的智能上的啟發」（〈むすめ〉，頁 27）。之後梶子與春吉的戀愛關係開始的同時，便知道兩人無法修成正果。因為春吉只要一想起雙親的面容，便坐立難安。相對於春吉背後雙親的面影，梶子便不得不與自己的雙親做比較。想到總是為春吉送來日常用品的母親，梶子表面上看來似乎毫不在乎，然而心中卻是迂迴曲折，五味雜陳。

這樣的呈現，似乎為真杉靜枝文學當中對於情慾描寫的淡薄乃至壓抑的筆調、以及真杉靜枝在情感生活和男性閱歷豐富的印象——這二者之間間隙落差，提供了解讀的線索。在〈女兒〉中，母親早早為梶子安排結婚的理由，除了行家父長權的管理，避免女兒身體的純潔遭受「汙染」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考量則是經濟因素。梶子的結婚對象松本忠左衛門是個大膽粗放的男人，在母親眼中，與「家裡的父親完全相反」。雖然父親善良又正直，但在生活方面卻是個「無能者」，這也是母親始終的抱怨，而相信這個自己看中的夫婿能使梶子生活無虞。然而就梶子的立場，婚姻並非是「生計」的保證，而是藉以脫離母親的手段。對梶子而言，離開雙親所在的「故土」台灣來到「內地」尋求獨立自主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獨立」。然而這樣的獨立卻非出於完全的自主自願，也因此在「內地」的生活過程中，梶子在男性關係當中尋找的是雙親所未能給予的「慰藉」，而非如母親為自己所安排的婚姻般，是使自己「生活無虞」的手段。

就在梶子夢見母親被火車輾斷大腿，而後逐漸忘卻的同時，妹妹光代來信告知母親臥病。妹妹在學校已有工作但家裡無女傭，三個孩子在家中鬧翻天，自己已相當疲累。梶子對於妹妹的遭遇非常同情，同時對於自己只將關心放在妹妹身上而非臥病的母親，感到非常不可思議。然而母親被電車輾過的夢境所顯現的，是與母親血脈的連結。然而做夢後的第二天，梶子的心情卻彷彿又遠離了母親的病榻。此後也從未問起母親的病況。此時，梶子與春吉的關係卻是日漸險惡，而其與春吉又因為工作的關係，踏上台灣之旅。「春天四月，台灣已是接近盛夏的炎熱。在基隆上岸的同時，彷彿如成熟的果實般，各自分道揚鑣後便在這稍稍炎熱、晴朗明麗的小島展開旅行」(〈むすめ〉，頁38)¹⁴。梶子坐

¹⁴ 「春吉」應以中村地平為人物藍本。1939年3月18日文藝欄〈學藝抄〉(がくげい抄)，報導中村地平當時正在台灣訪問；1939年4月5日文藝欄報導，中村地平在台期間進行演講「寄予南方的心情」(南に寄する心)。由其中內容可得知，中村地平是以當時日本拓務省「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一員的身分赴台，此次訪台期間參訪了「七個都會，五個蕃界」。同年4月8日的〈學藝抄〉(がくげい抄)報導中村地平踏上東京的歸途。從這當中可推敲出中村地平可能銜命前來台灣，也因此，返日之後中村地平所創作的〈霧中蕃社〉以及〈長耳國漂流記〉台灣相關作品，都是「國策」方針下的一環。不過中村地平對於自己的作品，已與當時的「國策文學」清楚地畫出了界線。參照中村地平，〈台灣と文學〉(上)(中)(下)，《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1月15-16日、18日。

上返鄉的火車，眺望窗外的景色，發現自己正走在當時離家的道路。梶子的家人在梶子離家後便離開中部，搬至南部；原本在中部擔任學校教師的父親，現在則在南部擔任神社的神官¹⁵。久違的妹妹與姪兒到車站迎接自己，一起返回神社時，發現身穿白色和服與褲裙的父親以及母親站在社務所的玄關等待自己。隔了十五年未見的母親，發出了高亢的笑聲打了招呼，那消瘦的身影幾乎讓人認不出。隨著母親高亢的笑聲，梶子與妹妹光枝似乎非得掩飾甚麼似的，只是扭著身子放聲笑著，並不打招呼。

梶子休養了幾日，「似乎要將身體的色素重新染過般，在這家中好好地睡了幾日」(〈むすめ〉，頁44)。每天眺望著芒果以及蓮霧果實的顏色日漸成熟，在這南國台灣的景色當中，梶子忽然回想起東京的事，覺得就像是從遠處眺望洶湧的波濤。這個時候，母親希望梶子陪自己到在病中給與關照的人家去，一起打聲招呼。母親對那戶人家的太太說：「女兒擔心我病後的狀況，特地從東京來探望我」(〈むすめ〉，頁45)。聽到母親如此一說，梶子不禁覺得羞愧，母親一定也清楚知道梶子完全沒想過自己。梶子是懷著這樣不孝的心情來到此處。即使如此，母親一定從很久以前便想到這裡來如此誇耀一番。然而，此處的太太卻用手帕掩著眼，說：「能活著見到你女兒真是太好了呀」(〈むすめ〉，頁45)。梶子聽說在醫生宣告病況絕望的情況下，這位太太悉心照顧了母親好幾日。此時梶子第一次感覺母親臥病的悲慘身影啃噬著她的心。一想到母親要是就這麼死了，梶子也初次感覺到難以忍受。再加上自己在東京時對母親毫不關心，如果讓她就這麼死了的話，實在太過殘酷。這樣的感覺，沉重地滲入梶子的心中。而此次與梶子再會，母親似乎也懷著種種考量。就算只是簡短的日常會話，她

¹⁵ 〈甲斐なき羽撃き 真杉静枝氏の隨筆集〉《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10月15日)文藝欄介紹真杉静枝的隨筆集《無謂の振翅》(甲斐なき羽撃き)時，提到此作品是「去年作者回到雙親居住麻豆的旅途中，用筆記錄了眼之所見、心中所投射的，台灣正在變化的身影」，由此可推測，當時真杉静枝的雙親居住於麻豆，也是真杉静枝訪問的目的地。蜂矢宣朗〈真杉静枝と台湾—「むすめ」と「ながれ」から〉，《天理台灣研究会年報》第四期(1995年)中指出，1938年發行的《台灣總督府職員錄》中曾文神社的項目記載著真杉千里的名字。根據《台灣日日新報》1936年7月11日〈舉郡一致・麻豆街に曾文神社を建立 國民精神の作興に資すべ工費は七萬圓程度〉報導，1936年7月決定興建曾文神社，1938年3月6日報導，同年3月19日將舉行竣工鎮社祭。參照〈曾文神社鎮座祭 十九日盛大に執行〉，《台灣日日新報》，1938年3月6日。〈女兒〉中真杉静枝所描寫雙親家中的宏偉神社，應該即是1938年3月落成的曾文神社。

也因為之前梶子反抗的態度而吃足了苦頭，所以非常小心翼翼。到了梶子終於要離家的時候，只有母親搭著火車來到轉乘的車站送行。全身似乎只看得見骨頭的母親「似乎被發車尖銳的鈴聲衝撞般，梶子見到母親腫脹雙眼上的眉毛忽然垮了下來」(〈むすめ〉，頁 46)。「火車度過濁水溪時，梶子發現自正陷入了滿溢的情感當中，不讓母親看到的眼淚此時正源源不絕地流出」(〈むすめ〉，頁 46)，這個時候，梶子所記錄下來的筆記如此寫道：「火車開動時，寂寥緊緊地依附我的心中。返回東京之後，我想我這次一定會努力成為傑出的人」(〈むすめ〉，頁 46)。

梶子戲劇性的歸「鄉」，與大病初癒的母親在睽違十四年後再次相會。在基隆碼頭往南部的路程，梶子「坐上返鄉的火車，眺望窗外的景色，發現自己正走在當時離家的道路」(〈むすめ〉，頁 46)，點出梶子出／歸鄉的旅路行經的是相同而逆反的軌跡。回到父母所在的台灣南部休養幾日之後，彷彿脫胎換骨般，此時梶子的心境已有了轉變：她是在「異鄉」漂泊過後返回「故鄉」休憩的遊子；而此處所描寫的「故鄉」台灣已成為自己精神安定的支柱。其安定的泉源正因這是自己父母所在的「故土」，也因此，當梶子身在「這南國台灣的景色當中」，東京的種種一切「彷彿覺得就像是從遠處眺望洶湧的波濤」(〈むすめ〉，頁 44)。在這裡，「東京」反而被「異地化」(outlandish)，成為梶子從「故鄉」台灣遠眺的紛擾之地。當梶子與母親和解之後，再度離開故鄉「台灣」，懷抱著的是「立身出世」的願望，希望自己能成為「傑出的人」。梶子與春吉在台北車站碰頭，當春吉詢問梶子母親的狀況時，梶子拭去眼淚不讓春吉看見，卻連跟春吉說明「自己有了很大的改變」都覺得憂鬱。但也由於其與母親達成和解，一直以來藉由男性關係以尋求彌補親情缺憾的梶子，在小說結尾有了巨大的轉變：「梶子注意到了——與春吉分手也已經不再那麼痛了，轉變後的自己有著那樣心情。」(〈むすめ〉，頁 47) 這是此次歸鄉之旅給她帶來的轉變。而真杉靜枝在〈我的生活〉(私の生活)對此次「歸鄉」之旅的感想，更可成為佐證：「前一陣子我到台灣與我睽違十六年的母親見面。連續過了十六年彷彿沒有父母手足以及故鄉的生活，在見到他們之後，彷彿身體長出了至今為止所沒

有的脊椎……我的骨肉至親的面影在我心中美麗地閃耀著，給予我生活上的力量。」¹⁶

在真杉靜枝的自傳小說〈女兒〉與〈某個女人的生平〉中，「台灣」成為愛憎交錯（ambivalent）的記號，雖想逃離卻無法割捨。也正如〈女兒〉的結尾所呈現的，起初她一心想逃離的殖民地「台灣」，卻成為她精神安定的寄託，因為這是自己父母所在的「故鄉」。這樣的曖昧性，一如她雖有著多采多姿的戀愛關係，卻又對「處女情結」有著強烈的迷思與劣等感。透過她自傳小說強烈的暗示，這矛盾的根源似乎可解讀為來自母親強加於她身上的觀念及其「殖民地台灣」的成長背景。而真杉自傳中所呈現如父母這般的台灣渡來者，意味著的是—群在「內地」被邊緣化的「敗者」集團——無論在「社會階層」或者是「經濟階級」的意義上，都屬於「敗者」。在「殖民地」台灣，這群「邊緣」集團所構成的日本人共同體社會則更保守封閉。他們在內地社會因「社會階層」或「經濟階級」的劣勢而來到「殖民地」台灣，真杉靜枝在自傳小說中對於母親形象的呈現，可看出「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對於共同體中的「世間風評」與「經濟力」的優劣最為重視。也因此，真杉靜枝在自傳小說中對於女性主體性的主張與家父長制之利害關係的衝突，以自己作為例子，在殖民地台灣的舞台屢屢上演。

三、結語

透過爬梳真杉靜枝戰前戰後的自傳小說〈女兒〉以及〈某個女人生平〉中作者的自我型塑，可發現與一般認知甚至貼上「惡女」標籤的真杉靜枝形象有所差異。其自傳小說的自我型塑，與真杉靜枝的出生、以及雙親與家族移民至「台灣殖民地」的原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同真杉多采多姿的戀愛經歷相比，其傳記小說所直接投射的戀愛觀卻是缺乏雙親愛情的慰藉，且其「貞操觀」與「處女情結」又反映了真杉對於自己「殖民地台灣」出身者的「貞操」墮落的

¹⁶ 真杉靜枝，〈私の生活〉，《甲斐なき羽撃き》（東京：協力出版社，1940年9月），頁19。

負面形象的過度恐懼與壓抑。這樣原始形象的根源，便是來自於「母親」——而這也是「母親」與父親之所以渡來「殖民地台灣」的主要原因。

真杉靜枝所隸屬的「殖民地台灣」下層移民階層，讓她能深刻解析這群「帝國邊緣者」在社會地位以及經濟問題的底層結構。她初期的台灣書寫反覆地以「台灣殖民地」記號來呈現這些底層日本移民的內部結構，同時也是她在「殖民地台灣」的生命體驗。有別於占據優勢社經地位的男性殖民者視點，真杉靜枝初期的台灣書寫呈現出「灣生女性」企圖掙脫殖民地，卻在內地（＝帝國核心）再度落入性／別弱勢的陷阱。而其自傳小說乃至初期作品中反覆的台灣記號書寫，也呈現底層階級的日本移民與「殖民地台灣」邊緣結構的癒合關係。他們儘管身為「殖民者」，在土著化的馴染之中，其母國的語言、文化與記憶竟漸漸被「殖民地台灣」所侵蝕。即便真杉靜枝一直以來企圖逃離「殖民地台灣」，但弔詭的是，「殖民地台灣」的魅影卻盤據於其靈魂深處，成為她的「精神原鄉」，而這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真杉靜枝與「台灣＝母親」之間的愛恨糾葛。

參考資料

一、文本

真杉靜枝，《甲斐なき羽撃き》（東京：協力出版社，1940年9月）。

真杉靜枝，〈むすめ〉，《愛情の門》（東京：国際女性社，1948〔1940〕年），頁4-47。

真杉靜枝，〈ある女の生立ち〉，尾形明子、長谷川啟監修，《戦後の出発と女性文学》第八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3年），頁133-162。

二、專書

十津川光子，《悪評の女—愛と悲しみの生涯》（東京：虎見書房，1968年1月）。

王德威・黃英哲編，《華麗島の冒険》（台北：麥田出版，2010年1月）。

石川達三，《花の浮草》（東京：新潮社，1973年）。

武者小路實篤，《武者小路實篤集》（東京：筑摩書房，1976年）。

河原功，《台湾新文学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学との接点》（東京：研文出版，1997年）。

齋藤美奈子《モダンガール論》（東京：マガジンハウス，2000年），頁134-146。

三、論文

（一）期刊論文

蜂矢宣朗，〈真杉靜枝と台湾—「むすめ」と「ながれ」から〉，《天理台灣研究会年報》第四期（1995年），頁103-114。

（二）學位論文

李文茹，《帝國女性と植民地支配—1930～1945 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大學院人間情報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5 年）。

四、報紙文章

中村地平，〈台灣と文學〉（上）（中）（下），《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1 月 15-16 日、18 日

石川達三，〈女流作家をモデル 放浪の半生をきびしく告発〉，《読売新聞》，1965 年 10 月 3 日。

真杉靜枝，〈父を送る日〉，《読売新聞》，1933 年 10 月 11 日。

真杉靜枝，〈新銳台灣作家紹介〉，《週刊朝日》，1941 年 6 月。

〈舉郡一致・麻豆街に曾文神社を建立 國民精神の作興に資すべ工費は七萬圓程度〉，《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7 月 11 日。

〈曾文神社鎮座祭 十九日盛大に執行〉，《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3 月 6 日。

〈甲斐なき羽撃き 真杉靜枝氏の隨筆集〉，《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0 月 15 日。

